试论道光季年对外开放问题

袁闾琨　董守义

道光季年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性年代。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不要开放？要不要面对世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要不要承认世界经济秩序等。对于这些，道光季年敏感的中国人已经有所悟及，但由于沉重的民族文化积淀，这些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一、微弱的开放呼声没有唤起全民族的共识

19世纪中叶，英国竭力要打开中国市场。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安家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①。

当时，掌握权力的中国清朝统治者，对这一世界历史趋势却多无体认，仅开一口通商，并没有想到也不企求从对外贸易中谋求中国的发展，这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和闭关自守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以英商为代表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正当的商品贸易中获利，遂阴以鸦片贸易扭转贸易逆差并谋求暴力，逐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多方面严重影响。

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之初，与所有中国士大夫一样以为对外贸易只有利于外国，他给各国商人颁谕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②这种近似恫吓的说法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此时他的语言与数十年前乾隆帝答复英使马戛尔尼请求通商是同一腔调。他以恩赐的观点对待中外通商："茶叶一物，尔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大皇帝于尔等有关性命之物，曾不稍为靳惜，尔等昧于情理，乃以鸦片烟害我中国民命"。③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原来实行的限制出口的政策不利于刺激国内商人的积极性。他给道光帝上密折建议提高出口品货价，鼓励生产以弥补外贸漏卮："因思茶叶、大黄、湖丝，皆内地宝贵之物，而外洋所不可一日无者。闻每年出洋交易，约抵七八百万，第核其所卖之价，不过与内地价相同……。如将售卖出洋之茶叶、大黄、湖丝等倍蓰其价，凡闽浙苏皖川楚等处客商，似皆无不乐从，且其交易悉由洋行，并不必与外夷对议，每年内地收回之价值，或可稍偿前此之漏卮"。④这里面虽然仍错误地说外国人一天也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和湖丝，但已经说明他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变化，主张参予国际贸易，可以说，这是中国负责官员中最初的开放思想。

从这种开放思想出发，他正确地把鸦片毒品贸易与正当商业贸易相区别，奏请道光帝在各国商人缴出鸦片之后仍准许照常贸易，主张"奉法者来之，不法者去之"，外商必须出具甘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方准贸易。这个要求虽较严厉，但合乎情理，他估计外商仍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因外商只凭正当生意亦可获大利："来粤贸易，实利市三倍，不惟以该国之货牟内地之利，并以内地之货牟各国之利"。他进一步指出中外通商是历史大趋势："利之所

在，谁不争趋，既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令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获利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以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⑤他道破一个规律：追求利润是新时代人们行动的杠杆。到五、六十年代，内地华人见洋人获利丰厚而垂涎的事情果然大增。到七十年代便出现郑观应、马建忠等所提倡的与洋商争利的“商战”。

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横蛮拒绝林则徐的合理要求，制止英商具结，并派兵船开炮挑衅，但被清军水师击败。大官僚曾望颜立刻奏请封关禁海，不论何国船只一概不准互市。林则徐立刻上折反对，指出不能因英国挑衅而断绝其他国家的通商：“若概以之绝，则缺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⑥

道光帝被小胜冲昏了头脑，指示林则徐：“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⑦接着，又明确训示：“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以后，反复无常，……即使此次具出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⑧

林则徐的立场是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既允许外商来华，又希望华商投身外贸，以便富国裕民。当时，邓廷桢、怡良、祁𡎴都是赞同者。道光帝及曾望颜等君臣则企图闭关绝市，一劳永逸，一厢情愿地省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种种纠葛。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一部分人注目于西方史地，进而引进并仿学西方船炮技术，从而形成一股军事文化开放潮流。

首先是林则徐在广州收集西人报刊资料，包括商业情报、传教小册子和西方史地书籍，命人编译为《四洲志》和《华事夷言》，既使获咎罢职，仍向道光帝进言：“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附带说明一下，已往有些论者说林要求以求和之款做造炮造船之费，是断章取义。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所谓“通夷之款”是指用粤海关所收与“外夷”通商所得之税款做为造炮造船的经费。粤海关向来被皇家视为利薮，林则徐居然要求取关税研制新武器，表现了他的无私无畏。⑨甚至被贬赴新疆时，仍念念不忘学习西方长技。他给友人信中痛切地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⑩遗憾地是林则徐始终没有公开提出改革军事的主张，也始终没有公开提出文化开放的要求。

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意识在三个领域内，继续有所表现。

1.海防。战争结束之初，从道光帝到沿海督抚大吏对海防均相当重视，道光帝面对战败的现实，不能不承认西方武器精良。耆英为他购进洋式大小二筒枪和六眼小枪，他反复把玩，赞为“灵捷之至”，“绝顶奇妙之品”。谕令耆英再为他寻觅外洋铜帽之火药方，并再购进些洋火药。有按方仿造之意，只是由于洋人对制造铜帽火药之方保密而未能如愿。⑪道光二十四、五年，他多次指示沿海沿江各省增固炮墩、增设炮位，铸造抬炮和抬枪。当然，多属旧式。但道光二十五年冬，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时，曾改制大炮，仿造西洋炮车的推轮运送法，次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制造火攻炮子和炸炮子，均获道光帝谕准。⑫道光帝还对战争期

间捐资仿造战舰水雷的广东绅商潘化成、许祥光等人赏予布政使衔或道员衔。这些都说明道光帝对西方长技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有认识尚不等于认同开放。随着战争烟云的消散，他越来越倾向于防范国内人民而限制对西方武器的仿制，尤其不许普及，甚至谕令洋式武器连平时训练时也不许拿出来使用，借口是“以归简易而藏妙用”。⑬后来竟然退步到“不得雇用夷人制造或购买轮船。”⑭

最高统治者的保守性、闭塞性和专断性致使林则徐、讷尔经额仿制西式武器活动无人承续，海防仍复旧观。

2.学术界。战后学术界出现了研究外国史地及边疆史地的热潮魏。源是其中姣姣者。他先作《圣武记》一书，目的在于以清初征讨四境的武功振奋国人的爱国精神。接着他撰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

然而，那些以爱国为职志的外国史地研究者多是“尊王攘夷”论者，皆力主抵制中外接触和交流。梁廷枏直截了当地批评“师夷”说“失体孰甚”。⑮

3.东南大员。一些东南官员在落实条约过程中，逐步加深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理解，倾向于在开放中抵制侵略要求。

第一被派到广州主持对外通商事务的伊里布，对开放大趋势抱认可态度。帮助他落实条约的广东按察使黄恩彤也力主在遵守条约前提下，改善通商，弥补经济损失，即“捐释前嫌，示以宽大，裁减陋规，明定税则”，⑯积极地对外放开放。

在制订虎门通商细则时，黄恩彤高度重视税则改订工作。他先令粤海关清查以往税额、陋规及十三行抽提之数，悉数归公，根除额外浮收，使海关岁入增加3倍。再议增出入口大宗货物税，降低进口冷僻货物税。旧例，西洋参、钟表、洋缎征重税；而中国出口的茶叶，每担只征银1.3两，入口棉花每担只征1.5钱。黄恩彤与英方议定洋参、钟表和洋缎等均减收税款，茶叶、棉花税银分别增至2两和3钱。

耆英赴粤后，继续在税款上大作文章，经过谈判，将海关茶税增为2.5两，棉花增为4钱。由于冷僻货物税减收幅度大，走私不值得，洋商遂乐于报关输税；大宗货物又不易夹带走私，税额稍微调高，收入即很可观。于是，粤海关奏：新章未定之前，每年关税只在130万两左右，多时达160万两；新章实施后，连年征银至200—230万两。⑰

落实条约中开放五口的规定，官僚中分歧十分严重。上海道员宫慕久1845年在上海县城外划出一块地方租给英国人居住，并允许英领事入城，实现了平静开港。继而福州、宁波、厦门在福建巡抚徐继畲和闽浙总督刘韵珂着力排解疏通绅士阶层的反感后，勉强开放。广州则因十年汹汹不已的“反入城斗争”而未能开放。

伊里布初到广州，绅民纷纷组织社学，反对英人入城，“募勇数万，结队横行，骄悍难制”。在他的授意下，粤督祁𡒄、布政使徐继畲及按察使黄恩彤等遣散壮勇，使之由3万人削为几千人，同时拿获煽动反抗情绪的钱江、何大庚等著名绅士，“一时省城顿形安谧，而各属盗蠡起。”⑱用高压手段维持落实条约所需的和平环境，很难被广大人民所谅解，社会酝酿着新的不稳。伊里布忧思成疾，出缺郁死。

继任的耆英曾经企图抵制英人入城要求。他利用社会学领袖何有书等人的“拒夷”词呈，回绝了英使璞鼎查的入城要求。但自从去过香港以后，趋向于实现开放。他密奏道：英官要求入城，“不过以入署见官为荣，尚非别有他志”；“若不准进城，则深以为耻”。⑲1846年1月，他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联衔出示，称中外一家，他港已许外人入城，广东不能独拒。

不料一夜之间尽被毁去，奉派去与英人传达入城问题的知府刘浔遭到群众袭击，府衙被焚、毁。耆英只好推迟开港计划。

英方以为，不让进城就是仍被置于劣等人的表示；而广州人认为让外人入城就是对外屈服的表示。双方在入城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升级，从平日接触中的哄哄斗殴到互毙人命，1847年3月一小队英人划船到佛山镇遭到当地民众的砖石袭击，英军遂占据虎门炮台和广州周围的濠沟，威胁广州安全。道光帝只好表示："至进城一节，本属无足轻重"，谕令他相机处理。耆英与英使德庇时约定1849年4月6日以后开放广州。

耆英哄退英兵后，深知无力改变广东绅民及多数官员的排外成见，以"日夜焦心""肝郁时作""实形竭蹶"为由密请内调回京，远离是非之地。[20]

1848年，徐广缙升任总督，叶琛名任广东巡抚。他们备文英国新任公使文翰，否认耆英之约。文翰大怒，率英军舰驶入省河。广洲社学民团数万人（一说十余万人）齐集省河两岸示威。文翰命英军舰游弋于虎门外，作准备战斗姿态。徐广缙、叶名琛以封舱闭关、停止贸易回击。文翰因英兵过少只好作罢，提出一份抗议性声明，留作日后发动战争的伏笔。徐广缙、叶名琛报告道光帝英人因"众怒难犯"已取消入城之请。道光帝多年的心病顿时消释，大喜，赏徐广缙为子爵世袭，叶名琛为男爵。

伊里布、祁𡎴、徐继畬、耆英、黄恩彤等大员对开放的认可终于被徐广缙、叶名琛的闭关主义所取代。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就广州群众来讲，面对凭借武力强行入城的英国殖民者，有爱国的反侵略斗争的意义，但就封建统治集团来讲，维持封建闭关主义仍是他们所企求的。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士绅所鼓动起来的反入城斗争，是对开放的一种逆动。

二、对外开放的抵抗机制

鸦片战争把中国强行拖入新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清王朝的声威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21]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历史巨变没有思想准备，更看不透它的深远影响。他们习惯于按传统方式去思考，按习惯方式去生存，而不愿意接受新的世界。

开放论之所以没有成为民族的共识，有其深厚的经济因素，也有其弥漫于全社会的文化心理因素。

第一，中外通商，与"以农为本"的旧理论相冲突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尽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在若干部门中有了初步发展，但很不充分，未居主导地位。因此，只能产生微弱的代言人，却不能形成普遍的开放意识。鸦片战争前逝世的著名经济学家管同说："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亦竭蹶而从时尚。"他怀着地主阶级的狭隘心理敌视中外通商，说："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而靡靡然争求洋货，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对此，他不是主张通过中外交流以掌握西方长技，而是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加厉禁"，强令人们安于土劣之物，断绝中外商人，将国内已有的一切洋货"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22]

管同的思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鸦片战争，经济学家们非但没达到林则徐那样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贸易区别对待的认识，反而把国弱民贫的罪过完全加于中外通商，而不责鸦片贸易。孙鼎臣写道："岛夷番酋，艳中国之藏，作为奇技淫巧至毒之物，蛊我民而窃我财，而

洋为银之尾闾，塞之不能止，天下之银日益贵，民之为生之计日益穷，而乱由斯起也”。他由反对中外通商，进而主张削弱国内商品交流及货币制度：“古之民，衣食于农桑，皆取于地而成于人，故用之不穷。今之民，衣食于银，银非地之所岁出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用之久而穷，固其理矣。……由是观之，务本之效，亦可见矣。天下之生众矣，富之莫如重农，重农必先贵谷，贵谷必废银不可。银不废，则银与谷争轻重之势，谷不可得而贵也。或曰，银轻赍而谷重滞，黜银贵谷，民必不便。应之曰，农用粟帛，商用货财，以钱为货，而通谷帛之穷，安在其不便乎？其不便者商耳。夫农便而商不便，则是古征商之意，而吾所以驱天下而归之农之微权也夫”㉓减少货币流通，鼓励实物交换，压迫商业活动，是空想的谬论，却有广大的同情者。吴嘉宾致林则徐信中就说：“嘉宾尝以为今天下之贫患，皆由于粤省。……故非鸦片毒弭宜禁，他淫巧之物皆宜禁也。”“嘉宾尝私议，以为非重抑海疆贸易，以正其源不可。凡天下之赴粤贸易者，并由以县官起文，携货出粤省者，设重税以困之，禁天津商船出洋。凡中国之货与之夷易，每岁不得过定数，皆以货易货，设官主其事，使之不得有什百之计，粤人瘠则天下肥矣。”㉔

总之，断绝中外通商，并进而限制国内商业活动是地主阶级为保护自然经济基础而提供的最无实效的药方。

第二，忧患意识，与“耻言夷务”旧意识相矛盾

面对西力东渐的威胁，林则徐，魏源等主张从长计议，师夷长技，认真抵抗；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兢兢业业办理外事，力避战火再起；经世派学者翻检旧时治国药方。尽管主张的侧重点有别，方法智愚不同，毕竟都是忧患意识的表现。但绝大多数国人仍然沉睡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时人记述道：“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㉕“官僚筵宴，无日无之。……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㉖朝野上下，怕谈、厌谈不久前的失败，更不去设想未来可能遭到新的侵略。人们用万年和约即定，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自我欺骗，也用大皇帝刚刚“抚绥远人”掩饰战败来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定。道光二十六、七年时，一位有识之士在私信中惊呼“举世泄泄，讳言国政，以诡随为称职，以正直为不详，以谄谀为贤能，以忠信为谬妄，廉耻之丧、人才之衰，未有甚于今日。”㉗

诚然，耻言夷事不完全出于欺妄的动机，还由于一向以为不必侈谈远事，只要关起门来治国就一定能奏效。姚莹分析此中关键说：“盖自古名贤，皆恐世主侈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故深拒夷情不讲。明成祖、宣宗屡使通洋，取其图说，藏在职方，而世未之见。”姚莹对于关门治国的传统大不以为然，怀着深沉的忧患，著新书，大谈西事。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悟〔误？〕，欲我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非侈新异，欲贪四夷之功也。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顾不知忌讳耶？特不忍自负其心，冀中国有人一雪所耻耳！”㉘

第三，对外开放，与“开门揖盗”旧观念相混淆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但没有科学世界观的爱国主义只能是低层次的爱国主义。经过一次战争打击，人们对爱国的理解没有升华，反而走向“春秋攘夷之义”的偏颇。1842年，《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写道：“乃英吉利人者，其主忽女而忽男，其人若禽而若兽。凶残亡性、甚于虎狼，贪赎之心，不殊蛇虺。恒蚕食夫南夷，辄夜郎以自大”。㉙这

里，半是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仇视，半是对外国人的污蔑漫骂。

以“攘夷论”为核心的爱国思想无法区别侵略与交流，投降与开放的界限。在“华夷不能同处”思想支配下，从士大夫到广人民众都认为对外开放就是开门揖盗。这件公檄写道：“兹闻逆夷将入珠海，创立马头，不惟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决意置已订条约于不顾，要报战败之耻，而“纾圣主南顾之忧”。全文将民族情绪与忠君思想扭结在一起，发之于外的是反侵略的同仇敌忾，郁结于内的是传统的“夷夏之辨”。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准则面前，任何交流和开放的行动都失去了正义的光彩。

因此，称道外国人有长技可学的人有媚外之嫌。魏源的《海国图志》本是为反侵略出谋献策，竟攻击为“失体孰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与外国人交往者成为众矢之的。广东绅士潘仕成、许祥光等宴请外国人吃饭，群众视为汉奸行为，“哄于其门”。逼得他们不得不反复解释这是聘请洋技师，让他们给我国造船炮捍卫海防，否则决不能善置甘休。㉚

因此，按约落实开放事宜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官员都被看作引狼入室的民贼。1847年一件匿名揭帖上写：“若要享太平，先杀潘仕成；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指黄恩彤——笔者）自后不劳兵。广东多扰乱，总系这龟精。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倘欲除番狗，不离社学丁，义勇齐努力，尽忠答天庭，踊跃向前进，万古标姓名。”㉛

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恰如魏源所言，“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靡费”，“苟有议翻译夷书刺探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嘉庆年间，广东有人编英汉字典，甚便于翻译西书，却被官方查禁。㉜

在封建士大夫鼓动下，绝大多数国人热衷于以“众志成城”的热诚保卫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社会，而把开放视为开门揖盗，把积极学习西方、开展对外交流视为崇洋媚外，把封建顽固派徐广缙、叶名琛奉为抗英英雄。

第四，应变图新，与“率由旧章”的旧习惯相抵触

魏源论定“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在理论上完全正确，规章制度只有因时变革，才能适应时势的发展。但当时人们总感到办事按旧习惯才顺理成章，方便舒畅。

清政府被英国战败，不得不按新章办事，而对其他国家仍企图继续按贡国待遇。俄国商船载货至上海，清政府以“该夷系北路陆地通商之国，上海非所应到”的理由，不肯破例，令其驶回。㉝美国和法国来华要求建立外交关系，清政府拒绝，美使和法使声言要北上天津申诉，清廷赶紧命广东官员阻止，传谕说：“西洋各国，向来不通朝贡，即北驶天津，亦必谕令回粤，所欲商议章程，亦必仍交耆英等酌办。”㉞坚持非朝贡国使者不得入京的旧制。

在广州绅民眼里，中外关系应如同暹罗、越南那样，外使携贡物入城，接受大吏筵宴招待，然后敬惕而出的严格宗藩关系。西方人，必须按道光十五年粤督卢坤的规定办事，即外商必须居于城外洋馆，每月只能到附近“散游”一次，每次不得超过10人，不得擅入村落市墟游逛，不得饮酒住歇，当天必须返回洋馆等等。㉟如果按新约办理，洋人随意入城，与中国大吏平起平坐，他们认为不成事体，不能容忍。所以地方官也以“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为借口来拖延和拒绝英人入城。㊱

对外开发，需要在动态中捍卫国家权益。林则徐主张既严禁走私鸦片又允许正当通商。这样的正确方针却与喜静厌动的士习抵触。连他的朋友张维屏也批评他“好大喜功”，荒谬地认为“禁烟令下而边衅遂开”㊲把中英开战的责任归于林则徐。黄恩彤力争在落实新约中

稍挽利权，有人却向道光帝告了他一状，称“其心术才具，喜应变不喜安常，愿有事不愿无事。……该员差要羁身，亟图光复，时思假夷务以自重。现因民夷相安，似觉无所表现，诸多缺望，急功近名之心过胜，即难免倒行逆施。在此一日，臣转多费一日防范。所以受命以来，惟伏以礼貌，不敢与闻机密，职此之由”。㊳不能认为这只是个人恩怨，它反映的是应变图新者与喜静厌变的封建文化心理的冲突 。

通过上述剖析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鸦片战争是自古未有的巨变。它使中国士人大夫阶级陷于痛苦、迷惘和困顿。在文化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爱国要求中混有大量排外情绪。开放只是微弱的呼声，因此轻易地被闭关的舆论吞噬。开放论者具有高于同代人的视野，也感受着孤独和压力，为当世不容。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新旧社会转型的时侯，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作用，制约着因时利革的进步行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传统文化的沉淀无比浓厚，这就决定我国从闭关走向开放的进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

① 《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③、㉕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五册，第411；529页。

④、⑪、⑳、㊳《道光朝留中密奏》，《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三册，第463；472；474；518页。

⑤、⑥、⑨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0；795" 885页。

⑦、⑧、⑲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版，卷八，第232；243—244；卷七七，3081页。

⑩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一。

⑫、⑬、㉝、㉞、㊱ 《清实录、宣宗》中华书局影印大本，第39册，卷四二九，第382；四二四，328；四五九，792，四〇二，30；四〇三，316页。

⑭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2页。

㉜ 魏源：《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

㉚、㉟ 梁廷枏：《夷氛闻记》

⑯、⑰、⑱ 黄恩彤：《抚远纪略》，《鸦片战争》丛刊第五册，第419；436；422；419页。

㉑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页。

㉒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二。

㉓ 孙鼎臣：《畚塘刍论》卷一。

㉔、㉚ 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卷五。

㉘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㉖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

㉗ 卜起元：《上陕西巡抚林少穆先生书》，《潜庄文钞》，卷二。

㉙ 巫宝三、冯泽、吴朝林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154页。

㉛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1964年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 出版，第286—287页。

㊲ 张维屏：《松心文钞十卷·政治录《，《张南山全集》。